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追跡香港文學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ao Paulo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8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追跡香港文學

黃繼持 盧瑋鑾 鄭樹森

In Search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Wong Kai Chee, Lo Wai Luen, & William Tay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化研究計劃
Programme for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BN 0 19 590069 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追跡香港文學

黃繼持 盧瑋鑾 鄭樹森合著

談論香港文學，如果不太執着計較新舊雅俗，只就實際生態着眼，可說園地並不荒蕪。異卉奇花，別具一番景致。是否都稱得上帶有特定評價意義的所謂「文學」，在此未敢肯定，但香港報刊雜誌的連載、長篇短章，卻起碼有一定文字成品「娛樂消遣」的基本功能。

進殿堂，排座次，此於香港文學討論來說，大抵為時尚早。對治歷年的遺忘，首先還須尋蹤覓跡。遵循這未必完整的蹤跡，本書三位作者在此嘗試著作一「現象」的描述。

在作者這種「現象描述」中，讀者不難見出作者的價值意識，可看到作者從九十年代回覓香港文學歷史、重構香港文學多元化生態的努力和收穫。

本書三位作者同時合編有《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
《香港小說選1948-1969》《香港散文選1948-1969》《香港詩選1948-1969》（均列入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黃繼持，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學的傳統與現代》《寄生草》等。

盧瑋鑾，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文蹤》《承教小記》等。

鄭樹森，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文學教授，著述很多，包括有《藝文叢語》《從現代到當代》《奧菲爾斯的變奏》等。

Antony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
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編

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
文化研究論文集
陳清僑編

香港電影類型論
羅卡 吳昊 卓柏棠合著

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
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
陳清僑編

追跡香港文學
黃繼持 盧瑋瑩 鄭樹森合著

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
王宏志著

情感的實踐
香港流行歌詞研究
陳清僑編

誰的城市？
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
羅永生編

目錄

一

1. 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 鄭樹森 1
2. 香港小說的蹤跡
——五、六十年代 黃繼持 11
【附錄】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小說 黃繼持 26
3.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散文身影 盧瑋鑒 29
【附錄】香港青年散文格調描述 盧瑋鑒 35
4.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新詩 鄭樹森 41

二

5. 香港文學的界定 鄭樹森 53
6. 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盧瑋鑒 57
7. 關於「為香港文學寫史」引起的隨想 黃繼持 77
8. 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發展 黃繼持 91
9. 化故為新：
「香港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關係」漫談 黃繼持 103
10. 「南來作家」淺說 盧瑋鑒 113

三

11. 葉靈鳳的書話 盧瑋鑒 125
12. 香港淪陷期間，兩種鮮為人提及的作品 盧瑋鑒 131
【附錄】《吞旗隨筆》是「物證」之一 盧瑋鑒 137

目錄

13. 侶倫早期小說初探	盧瑋鑾	139
14. 「劉以鬯論」引端	黃繼持	153
15. 張愛玲與兩個片種	鄭樹森	161
16. 西西連載小說：憶讀再讀	黃繼持	163
17. 讀西西中篇小說	鄭樹森	181
18. 試談小思散文		
——以《承教小記》為主	黃繼持	187
後記	鄭樹森	199
鳴謝		200

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

鄭樹森

和香港「開埠」的一百年相比，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可說是非常興旺。這個發展的歷史淵源則是國共內戰。抗日戰爭時期不少中國文化人曾經南來香港暫避戰亂，因此也在香港繼續創作。^①四十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再次迫使大量中國知名文藝人士來港暫居；1948年在香港活動頻繁的就有郭沫若、茅盾、夏衍、歐陽予倩、秦牧、柯靈、吳祖光、司馬文森、邵荃麟、馮乃超等（學界則有翦伯贊、侯外廬、鍾敬文等十多人）。四十年代後期的香港文藝活動相當密集，但由於當時旅港文化人絕大多數來自左翼，文藝活動往往實質上是「反國民黨、反帝、反殖」為主的政治活動。《白毛女》、《小二黑結婚》及《人間地獄》（即柯靈、師陀據高爾基原著改編的《夜店》）等1948年的演出，可見當時香港文藝的左派色彩。這個傾向在1949年開始轉變，因為是年中共在大陸不斷告捷，左翼文化人陸續北返，參與中共建政；而與此同時，司馬長風、南宮搏、林適存、趙滋蕃、徐訏、徐速、力匡等右派文人先後南來。

① 參看盧瑋鑾《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1987）。

南來作家的左右對壘，很快就捲入當時美蘇兩大霸權的冷戰對峙。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加強圍堵共產主義在華人社會的蔓延，由華盛頓幕後支持的「亞洲基金會」，在1951年先後資助人人出版社及友聯出版社在港成立。前者出版的「蘇聯問題叢書」和「美國問題叢書」，不免大力批判共產主義和宣揚美國文化，但1952年5月創刊的《人人文學》雜誌（先後由黃思騁、力匡、齊桓等主編），則讓當時生活困頓、欠缺發表園地的右派文人，較能安穩地開展右翼文藝工作。相形之下，友聯出版社的影響在香港更為深遠。1952年7月25日創刊的《中國學生周報》是五、六十年代不少香港青年作家（及部份台灣作家）的重要園地，不少至今仍活躍香港文壇及文化界的作家，早年都在此起家。友聯出版社更針對不同的讀者羣，創辦性質不同的《祖國》（1953年1月5日）、《大學生活》（1955年5月5日）和《兒童樂園》（1953年1月16日）等雜誌，同時又成立發行公司、印刷廠和「友聯研究所」（專攻中共問題），成為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化重鎮。五十年代參與友聯刊物及出版活動、至今仍較為人熟悉的文化人有余英時、孫述宇（費立）和胡菊人等。六十年代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編務的年輕作家有陸離、羅卡、羊城和蔡炎培等（停刊前則有李國威和也斯等）。而六十年代美國愛奧華大學開辦國際作家訪問交流計劃（亦間接由美國國務院資助），邀請的香港作家，仍以出身《周報》的作家為主，如戴天、溫健驪和古蒼梧等。

五十年代另一由「亞洲基金會」資助的右翼文化機構是1952年9月成立的亞洲出版社，由報人張國興負責，除專題研究（反共專著為重點），亞洲出版社以文藝創作為主，是五十年代香港「反共」小說的大本營（粗略估計當在二百種左右）；並有翻譯、連環圖、兒童及青少年叢書等，是當時較多樣的圖

書公司。1953年5月該社又創辦《亞洲畫報》，「反共」仍為基調，但多次舉辦短篇小說比賽，對當時港、台、南洋等地的青年創作風氣，不無影響。該社又曾組織亞洲影業公司攝製國語片，其中多部以當時較認真的小說為底本的電影，如1956年的《長巷》（沙千夢原著、卜萬蒼導演）及1957年的《半下流社會》（趙滋蕃原著、屠光啟導演），可視為五十年代右翼電影界改編文學作品的代表。

美國間接支援右派文人之外，還直接通過美國新聞處宣揚其文化及價值觀。1952年3月創辦綜合性月刊《今日世界》；稍後以今日世界出版社名義中譯及刊行美國文學名著與其他思想專書（部份曾由人人出版社刊行，先後參與中譯的名作家有林以亮、張愛玲、姚克、劉以鬯等）；以及替張愛玲出版《秧歌》和《赤地之戀》英文原本（1955年和1956年），來向西方「宣傳」。

面對右派勢力，香港左翼文藝陣營也努力因應，但似乎資金較短缺。出版社方面，香港三聯書店以發行中國內地圖書為主，後來另有南粵和朝陽等出版社輔助出版業務。外圍書店也不少，例如南苑書屋、新地書屋、萬里書店和上海書局；牌子老的尚有香港商務和香港中華。雜誌方面，左翼也盡力抗衡。1956年4月《青年樂園》創刊，爭取《中國學生周報》同年齡層讀者。1959年4月創刊的《小朋友》，應是要和《兒童樂園》「對着幹」的。1957年1月創刊的《良友雜誌》似是針對《亞洲畫報》。比較正統的文學雜誌則有1957年6月創刊的《文藝世紀》。報章方面，左翼除原有的《文匯報》和《大公報》，1950年10月再創辦《新晚報》（1956年9月5日開始連載金庸的《書劍恩仇錄》）；1952年10月又增加《香港商報》（1956年1月1日開始連載金庸的《碧血劍》）。這些報章都有連載小說和

專欄混合的一般副刊；而《文匯報》更加關類近49年前《大公報》副刊的《文藝》周刊（由絲韋主編，至1966年底因「文革」而停頓）。整體而言，以書籍及雜誌的出版數量比較，五十年代左翼文學是落後於右翼的，這在前六、七年尤為嚴重。報章方面，《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三份正統的，加上周邊的《商報》、《循環日報》和《晶報》（1956年5月5日創刊），尚勉可匹敵。及至「文革」爆發，香港左派在1967年5月全面響應，發動「反英抗暴」的極左鬥爭，左報銷量大幅下跌。^② 外圍左報如《新午報》、《田豐日報》、《香港夜報》更在1967年8月被港英政府勒令停刊。《青年樂園》及其特刊《新青年》也在同年11月22日被勒令停刊。文學刊物方面，本來尚能統合非左翼作家的《海光文藝》（絲韋、黃蒙田主編），1966年1月創刊後，苦撐一年就自動停刊。另一份也是稿源較廣闊的《文藝伴侶》（李怡主編），1966年4月創刊後，8月就自行休刊。同時停產的還有當時的左翼電影公司。（中聯和光藝、長城和鳳凰等粵、國語片電影公司，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上半都曾各有表現。）左派文宣自此一蹶不振。

在東西兩大陣營的冷戰氣候中，左右雙方在五、六十年代香港華文社會，一直在意識形態上角力。當時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仰仗美援維持，可說是自顧不暇。香港的右翼文化如無美國資金的初步灌溉，在當日香港的經濟環境，恐怕早就夭折，遑論日後的茁長壯大，成為本土和獨立自主的力量。同樣，左翼如無中國幕後支持，恐連較為弱勢的經營也無法維持。當年相當激烈的左右鬥爭，雖也產生不少張口見喉之作，

② 左派報章的情況，可參看文灼非〈香港新華社如何透過左報做宣傳工作（1949-1982）〉《信報財經月刊》（1996年1月號）。

但也形成不少報章、出版社及雜誌為文學提供園地，間接孕育香港文學創作的局面。政治介入文學，後者幾必遭殃。但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除了「反英抗暴」一役，文學卻弔詭地自有所得。

回顧這段歷史，港英殖民地政府在這場意識形態爭霸戰，只是袖手旁觀，頂多偶然扮演「裁判」角色，可說是全面缺席。港英雖長期佔領香港，但一直沒有培育本地的英語文學。

（相形之下，加勒比海的小島聖露西亞，雖只有一家中學，學生上大學還得到牙買加，1992年卻有沃葛特以英詩創作獲諾貝爾文學獎。）或許這是因為英國向來只以香港為進入中國大陸腹地的經濟踏腳石，無心經營。^③當然，中國作為政治實體的繼續存在、華文使香港和母體文化始終未曾斷裂、華人在文化心理上的夷夏觀、香港和中國相比過於「渺小」等，都可能是英國在港只求平穩統治、不謀徹底「改頭換面」的原因。二次大戰後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的「政改」方案束諸高閣後，英國內部對香港的前途一直意見分歧。^④及至中共建政，為求維持現狀、保留在華立足點、顧全貿易利益，決定在1950年1月率先承認北京政府。^⑤而韓戰旋即爆發，中方在封鎖禁運中需要一扇對外開放的窗戶，香港的夾縫地位自此穩定下來。英國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在香港推行其一貫的殖民地語言文學政策，無意中

③ 參看黃宇和〈租借新界：為何「租借」？為何「新界」？為何「九十九為期」？〉，《明報月刊》（1994年1月號）。

④ Steve Yui-sang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⑤ 參看劉蜀永〈1949年前後英國對港政策〉，《二十世紀的香港》，余繩武、劉蜀永合編（香港：麒麟，1995）。

「讓」出整個隸屬上層建築的文化空間，對1949年後華文文化活動在左右對壘下突趨蓬勃，起碼實質上沒有造成任何阻力。

當然，殖民地政府在威權遭到直接挑戰時，是不會不回應的。右派的趙滋蕃和王新衡先後因為言論或行動被遣送去台灣；左派文藝人士司馬文森和劉瓊等1952年1月10日因政治活動被遞解出境；同年5月5日《大公報》被停刊等都是較著名的例子。但大體上，殖民地政府無民主、有自由的統治方式，使到香港的文化空間在當時海峽兩岸之間，是最開放和包容的。不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右傾或親左，甚或是不見容於海峽兩岸的托派，都能夠在香港自由活動。香港文化人均可自行選擇，並各自宣揚信念或落實創作理想。因此，就當時兩岸三地的政治及文化情況來看，香港可說是一種「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容許歧異的聲音同時爭鳴，接受相互排拒的論述和平辯爭。香港文化空間這個特色，使到六十年代成長的青年文化人，更能自主獨立，在沒有干預下自行摸索。綜合性全人雜誌《盤古》在1967年3月12日的創刊，正是本地孕育的新一代文化人開始成熟茁壯的表現。差不多同一時期，文社及電影會活動日趨蓬勃（例如藍馬現代文學社和大影會），也是成長的另一徵象。

這個開放的特色，加上地理上的利便，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壇與新興外國文化思潮的接觸，比大陸和台灣都較為迅速和緊密。早在1955年11月10日法國文化協會舉辦的演講，就包括卡繆（Albert Camus，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薩特（又譯沙特，Jean-Paul Sartre，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1956年2月18日《文藝新潮》月刊（馬朗主編）的創辦，在譯介世界現代文學方面（尤其是現代主義作品），就遙遙領先兩

岸。例如1956年的第二期，中譯英國詩人史提芬·史賓德(Stephen Spender)分析西方現代主義的著名論文，同時譯介當代墨西哥現代派詩人渥大維奧·帕斯(Octavio Paz, 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戰後美國戲劇名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家薩特、自稱「惡魔主義」的日本感官派小說家谷崎潤一郎、瑞典表現主義小說家及詩人拉蓋克維斯特(Par Lagerkvist)。第三期中譯將西班牙戲劇推入二十世紀的貝那凡特(Jacinto Benavente)、英國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T. S. Eliot, 194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希臘現代主義詩派奠基者沙伐利斯(George Seferis, 196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西現代小說名家馬查多(Antonio de Alcantara Machado)。第四期的法國文學專號，有二十世紀法國詩的選譯，從梵樂希(Paul Valéry)到夏爾(Rene Char)，完整而有系統；小說的五家，紀德(Andre Gide, 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中篇〈德秀斯〉和薩特的〈牆〉，都是戰後名作。從這三期的抽樣，可見當時部份香港文學界的「超前」現象。在譯介現代世界文學方面，《中國學生周報》的組織和自覺雖遠不及《文藝新潮》，但也持續不斷；曾繼《文藝新潮》之後再度譯介阿根廷小說家豪赫·路易士·博赫斯(Jorge Luis Borges)，並首次介紹德語女小說家瑪麗·路易絲·卡施尼茲(Marie Luise Kaschnitz)和伊爾莎·艾興格(Ilse Aichinger)的詩化小說，及法國羅布格利葉(Alain Robbe-Grillet)等「反小說」的「新小說」(nouveau roman)。對世界（主要是歐美）現代主義潮流的介紹和關注，雖以文學為主，但在藝術和電影方面，也有同樣的「先知先覺」。但今日回顧，香港在這方面的先驅性努力，往往因為缺乏物質基礎，未能深化和系統化，比起七十年代台灣及八十年代大陸的同類工作，規模就相當遜色。

香港的特殊自由空間，在五、六十年代的冷戰高峯，無意中也讓香港在文化上扮演中國與外界的溝通、轉口及中介地點。五十年代訪問中國的緬甸、錫蘭、尼泊爾、紐西蘭、日本等左翼文化代表團，都得先來香港。同樣，中國出外訪問的代表團，如1954年12月鄭振鐸訪問印度、1955年11月郭沫若等去日本開會等，也往往先經香港。西方左翼文學家訪問大陸，香港也是必經之地；如意大利小說名家蒙蘭德夫人(Elsa Morante)1957年10月來港、冰島小說家勒斯尼士(Halldor K. Laxness)同年12月來港，更不要說以香港作中途站經常來往的韓素音(Han Suyin)。而台北拉攏海外華文作家反共，香港自是組團重點。西方右翼文化人要收集反共資料，或到他們心目中的「前線」考察，香港自然不能錯過，例如冷戰時期美國極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及政論家約瑟夫·艾索普(Joseph Alsop)就多次來港。^⑥換言之，對不能夠或不願意去中國大陸的西方右翼作家，香港是「窺視」當時所謂「竹幕低垂」的中國的瞭望站。

香港之於中國，無論從地理、政治和文化的角度來看，都位處邊陲。但五十年代亞洲出版社及自由出版社印行的反共小說，顯然不全是針對本地的讀者，而是借重邊陲，向中原「喊話」。而一些報刊，如《香港時報》和《祖國》，也是白邊陲向核心發聲。至於學術上在香港開花結果的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甚至周邊的錢穆），只是立足香港，但文化上「一生為故國招魂」（余英時語）。這其實是文學家及文化人自動脫離母體後的必然現象。同樣，左翼文學家和文化人在香港的大量工作，也未可不能視為努力利用邊緣來確立新核心和新中原。

⑥ Robert W. Merry, *Taking on the World* (New York: Viking, 1996).

開始擺脫邊陲與核心的繆轡，逐步本地化和緩慢地塑造主體性，應是六十年代中、後期。這是年輕一代成長茁壯、作家南來暫住變成長期定居的結果。淮遠、辛其氏和何福仁等在香港出生、成長、受教育、以香港為寫作對象及發表園地的年輕作家，應是最易界定的香港作家。1949前後南來的作家長期在香港生活寫作，如劉以鬯和林以亮等，今日早已成為當代香港文學的前輩。南來作家中有不少短暫客寓後又離港發展的，如趙滋蕃和張愛玲等，雖居留不長，但留下取材香港、以香港為寫作對象的作品，如前者的《半下流社會》（1953年出版）和後者探討香港族羣關係的電影劇本《南北一家親》（1962年10月上映），都應視為廣義的香港文學。同樣，六十年代崛起香港文壇的年輕作家，後來因留學及婚嫁而長居國外，如蓬草和綠騎士，其作品就逐步脫離狹義的香港文學，隨着時間的流逝，變成廣義的香港文學。這種流動性和國際性，其實也正是這個小島城市在文學發展上的一個特色。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雖是當時最不受干預的華文文學，但也是物質基礎最薄弱、生存條件最貧困的。而當時政府圖書館的不聞不問，完全可以理解，但對今日的文學研究者，史料的湮沒，不免造成歷史面貌的日益模糊。任何選集、資料冊和文學大事年表的整理工作，都不得不面對歷史被遺忘後的窘厄，但也不得不去努力重構。而在這過程中，過濾篩選，刪芟蕪雜，又在所難免。換言之，重新構築出來的圖表面貌，不論是有意或無意，不免是另一種歷史的遺忘。

